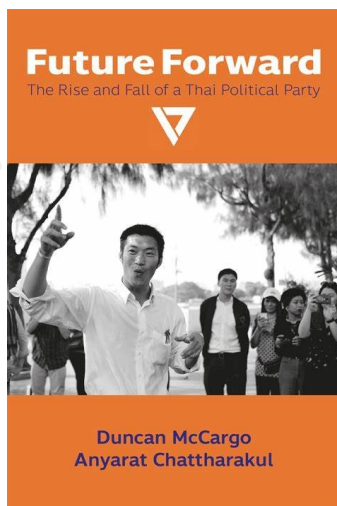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 邓肯·麦卡戈和安雅拉·查他拉库《新未来：一个泰国政党的兴衰》，梳理泰国新未来党的发展历程所折射出的泰国社会中日益激化的隔阂与分裂

维拉希尼·索米亚《非正规移民与马来西亚沙巴边境之海：远洋联盟》，聚焦沙巴边境地区非正规移民面对边境执法的抗争，体现出边境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社区不稳定的潜在危机

编者按：本期区域动态关注东南亚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与隔阂。泰国虽然在1932年爆发民主革命，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选政治制度才真正得到巩固。伴随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泰国地方政客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主导泰国政坛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民粹主义的传播和他信集团的快速扩张，泰国社会民意出现严重的两极化趋势，代表曼谷城市中产阶级的“黄衫军”，与代表外府农村地区民众的“红衫军”通过街头暴力的方式，撕裂着泰国社会。在此背景下，塔纳通的新未来党以“创造力和希望”为口号横空出世，成为泰国议会第三大党。邓肯·麦卡戈和安雅拉·查他拉库《新未来：一个泰国政党的兴衰》梳理新未来党的发展以及与他信派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借此著作折射出泰国社会中反专制和追求平等的呼声。本期介绍的另一本专著关注非正规移民与地方社区的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马来西亚因经济优势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而贫穷和缺乏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则催生了大量非正规移民的流动。维拉希尼·索米亚《非正规移民与马来西亚沙巴边境之海：远洋联盟》通过记叙马来西亚地区沙巴州非正规移民的口述史，反映了边境政策造成非正规移民面临被系统性边缘化和暴力驱逐的困境。政党与民主选举问题和非正规移民问题看似互不相关，但它们都折射出跳跃式的现代化发展给东南亚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



《东南亚时事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22年刊载关岛大学政治学教授阿伦·R·斯瓦米（Arun R. Swamy）为邓肯·麦卡戈（Duncan McCargo）和安雅拉·查他拉库（Anyarat Chattharakul）的新著《新未来：一个泰国政党的兴衰》（*Future Forwar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hai Political Party*）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麦卡戈系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任、政治学教授，查他拉库为该所研究员、利兹大学博士。全文编译如下：

对于研究民主的学者来说，泰国是一个悖论。它不曾被殖民统治，有着蓬勃发展的经济和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看起来比它的邻国更适于民主发展。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提醒我们的，泰国的君主制拥有实际的影响力，“经历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军事政变和宪法起草”，而且仅2006年至今就经历了两次政变、两部新宪法、七位总理，还有“九个政党[...]被法院解散[...]”（第2页）。本书的主角正是最近被法院下令解散的政党——生涯短暂却受人瞩目的新未来党（又译“未来前进党”，Future Forward）。该党在2019年大选中令人惊讶地强势获得第三多的选票和议席，又在仅一年后被取缔。本书的论述通过“领导人（Leaders）”“选民（Voters）”和“政党（Party）”三个主要章节展开，结合了对政党领导人、选民和议员（包括一些之后叛变的议员）的访谈，以及对选举结果和政党材料的详细分析，对该党的建立、运作、成功和消亡做出了细腻而深刻的分析。然而，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记录一个政党的历史。他们旨在以新未来党为例，揭示更宏大的泰国政治模式。在这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为泰党长期强大影响的处理。

邓肯·麦卡戈（Duncan McCargo）作品中熟悉的主题贯穿了本书。麦卡戈以其“网络君主制（network monarchy）”模型（第3页）闻名。该模型认为王室通过支持王室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网络对泰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本书的研究更多地借鉴了麦卡戈作品中一个更老的主题，即泰国政治改良主义（political reformism）自相矛盾（Janus-faced）的本质。自1957年以来，泰国民选政客的腐败和特殊议程为军事干预提供了借口，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皇派知识分子和基层活动家提出的改革方案提供了素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第108页），在选举层面上，新未来党继承了之前两次建立克服这种特殊主义的“变革性”政党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的佛法力党（Palang Dharma Party）以及21世纪初期他信的第一个政党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然而，尽管其基本盘与他信目前的政党为泰党有所重叠，新未来党的方案更接近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义思想，麦卡戈恰当地批评其为将信心投入非政治的道德领导（an apolitical leadership of virtue）。虽然新未来党对美德的构想与一些改革者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ic）愿景非常不同，但它对政治进程的关注超过了具体政策，这使其有别于泰爱泰党和为泰党。

他信的幽灵萦绕在作品中。他信在1997年宪政改革后凭借民粹主义纲领的力量上台。他持久的吸引力以及对保皇党构成的威胁形成了理解新未来党的基本背景。作者在相当简明扼要的导言中覆盖了与此相关的大部分内容。

第一章《领导人》通过对主要领导者人生经历的白描讲述了新未来党创建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该党的建立者塔纳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他是一位富有的年轻实业家，学生时代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塔纳通主要通过个人贷款为新未来党提供资金，这最终成为了解散该党的借口。他还招募了许多大学时的朋友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塔纳通被形容为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超级领袖”。他与选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建立起了个人联系，而这些年轻选民则围绕塔纳通成立了数字化粉丝俱乐部，制作了许多表达崇敬的表情包。塔纳通招募了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进步法学教授皮亚布特（Piyabutr Saengkanokkul），以及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全球政治硕士学位的电视新闻主播潘尼卡（Pannika Wanich），后者成为了新未来党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代表。这三人形成了被视为党的集体领导层的三巨头，直至他们被限制从事政治活动。本章介绍的第四位领导人披塔（Pita Limjaroenrat）担任起新未来党被解散后成立的前进党（Move Forward）领导人。

他们与他信的联系贯穿了这些记叙。塔纳通与西那瓦家族有不少业务和个人往来（第22-23页）。潘尼卡工作的电视台由他信的儿子部分持有（第32-33页）。披塔来自一个与他信政

府关系密切的政治家族（第42-43页）。考虑到西那瓦家族在21世纪泰国政治中的中心地位，这些联系并不令人惊讶，而且其中一些已经脱离与西那瓦家族的关系。尽管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联系对新未来党无异于是“阿喀琉斯之踵”，而确定新未来党与为泰党的关系是他们面对的关键战略决策（第23页）。

事实上，与他信有关的势力大力助推了新未来党在选举中的表现。正如本书多次强调的那样，转折点是混合成员比例代表（MMP）选举制对为泰党的影响。混合比例代表制正是因此在（由军方启发的）2016宪法中得到采用。由于为泰党通常在北部和东北部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往往在议会中取得相对其得票份额的超额代表，混合比例代表制的补偿机制最可能削弱它在政党名单中的席位。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信创建了第二个政党“泰爱国党”（Thai Raksa Chart），在为泰党的主要据点之外竞选，获得为泰党可能因为混合比例制补偿机制丧失的议席（第8-9页）。然而事与愿违，泰爱国党提名新国王的姐姐乌汶叻公主（Ubolratna Mahidol）作为其总理候选人，引起了王室的愤怒，导致泰爱国党在选举前两周被解散，使得他信派势力在大多数南方选区没有代表。新未来党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

第二章《选民》包含对2019年选举结果的详细分析、个体选民的画像，以及对新未来党竞选活动（包括集会和数字媒体宣传）的叙述。该党在年轻和初次选民中的影响力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便是它在社交媒体上压倒性的强势表现。尽管党员基础薄弱，但塔纳通本人就有超过百万粉丝（第92-93页）。此外，民意调查显示新未来党在四十岁以下选民中相较于为泰党和新的亲军方的“公民力量党”具有绝对优势（第99页）。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该党的支持来自“初选选民、城市中下层选民和城市化村民”——最后一类指的是居住在城镇，仍继续在农村选区投票，但不受传统农村拉票人影响的选民，而农村拉票人正是新未来党所避开的（第62-63页）。然而，对于所有这些支持，作者明确表示，与他信有关联的拉票人在许多为泰党不竞选的选区中都将新未来党置于优先排位（第69-70、105页）。

与他信有关联的拉票人对新未来党成功的重要性凸显了新未来党的纲领与其所获支持间的脆弱联系。事实上，很难说它的纲领到底是什么。确定一份纲领就像是网站的“内容创作”：核心特征或者说在此案例中，政党的“品牌”应当先行（第82页）。塔纳通自己估计“新未来党的选民中”至多“五分之一真正理解该党的政策和价值观”（第83页）。该党广泛地支持泰国国家的民主化和分权化，其最具体的政策是关于通过废除征兵制削弱军队的权力，用裁减下来的军事预算支付社会福利开支，但并未指明何种福利（第81-83页）。新未来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畏首畏尾，可能反映出了塔纳通本人商业背景的影响——他也反对

累进税率和最低工资（第16页）。但塔纳通也并没有与出身中下阶层的皮亚布特产生根本性分歧。皮亚布特的主要关切是减少交易投票（transactional voting），希望废除选举基金，这也被经验老道的政治家认为是向选民提供切实利益的重要措施（第98页）。最后，新未来党的“品牌”最持久也最受欢迎的遗产，恐怕是它的社会和文化主张。它代表了多样性和包容，在集会上积极发出了包括性少数在内各种少数群体的声音（第89页），并且反对泰国遵从长者和上级的传统习惯（第113-115页）。

第三章《政党》充实了新未来党的“品牌”既是其核心吸引力也是其关键弱点的看法。这一“品牌”包括它总体的非传统性、对数字媒体的高度依赖、以及对表演性活动的偏爱——这些活动可以凸显重要问题，但对建立联盟几乎没有助益。本章涵盖了从候选人选拔程序到议会表现甚至该党解散后的议会外动员的广泛领域。候选人选拔过程揭示了该党的组织弱点：新未来党选择通过在线初选来确定选区候选人，而这很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纵，这些政客招募他们的追随者作为成员以增加他们的获选机会（第120-121页）。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潘尼卡——表现出了举办公共活动的天赋，比如模拟不信任投票，在最高领导人被驱逐后通过互联网进行流媒体直播，提升了党的曝光度（第139-141页）。然而最终，新未来党在议会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它无法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尤其是担心与政府对抗的为泰党（第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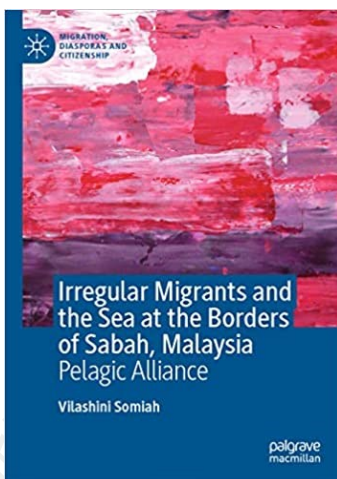
最后一章《未来》追踪了新未来党解散后的情况。塔纳通和其他被限制的领导人将政党政治交棒给了前进党领导层。前进党保留了他们最初的议会力量（第158-161页），发起了通过公民社会推广其理念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该运动继续展示出高度依赖数字媒体的组织模式的优势和短板。一方面，他们在曼谷以一场壮观的游击激光表演来标志他们的到来，投射反政府标语以纪念2010年被亲他信的红衫军暴力镇压的大规模示威（第164页）。另一方面，该运动的官方在线发布是很低调的（第162页），而它对数字媒体的依赖意味着它无法发起真正威胁到当权派的那种街头抗议活动（第157-158页）。

作者在结论中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未来图景，尽管也承认其他情况的可能性。这是本书最薄弱的部分。这些情境被贴上了不言自明的标签——塔纳通式和平（Pax Thanathorn）、现状继续、当权派式和平（Pax Establishment）和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但简短的描述没有说明其中任何一个可能会如何实现，也没有涉及他信主义的持续力量和影响。这些情境，或者说这本书本身，都没有探索为什么在2019年的选举中，公民力量党公然寻求将为泰党的平民主义定位与自己的福利政策相结合，成为了主要的保守派声音。为泰党和公民力量党的

成功表明了平民主义福利政策和其他民生问题长期的重要性。现有证据并不能说明通过数字渠道受到抽象理念动员的城市青年将成为泰国政治中的主要反对力量。相反，它表明，与多数民主国家一样，经济问题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作者们非常有先见之明。在我撰写本文的同时，学生抗议活动已在泰国持续数月，其中一些学生甚至还在读高中。他们呼吁减少学校的专制氛围、总理巴育下台，甚至限制君主的权力。尽管麦卡戈和查他拉库没有直接谈到新的学生运动，但他们的书为理解抗议者的动机提供了最佳窗口。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他们分析的细腻和严谨程度，任何对泰国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它对研究新兴民主国家的学者也非常有价值。

（英文原文见 Swamy, A. R. (2022). Book Review: *Future Forwar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hai Political Part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41(1), 163–166. <https://doi.org/10.1177/1868103421994254>, 本文为开放获取）



《东南亚时事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22年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博士研究生法迪娅（Fadiyah Nadwa Fikri）对马来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高级讲师维拉希尼·索米亚（Vilashini Somiah）博士所著《非正规移民与马来西亚沙巴边境之海：远洋联盟》（*Irregular Migrants and the Sea at the Borders of Sabah, Malaysia: Pelagic Alliance*）的书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居住在沙巴州的非正规移民（irregular migrants）往往生活在经济不稳定中，还时常面临触及移民法规 and 政策的严重后果，这些法规通常将他们的非正规迁移定为犯罪活动。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和政策常常会导致他们被突袭、逮捕、拘留和强制遣返。鉴于这样严酷的现实，

《非正规移民与马来西亚沙巴边境之海：远洋联盟》的导言部分（第一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被驱逐的非正规移民甘愿冒着被抓住的风险，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呢？”（第1页）。

这本书主要聚焦于来自棉兰老岛（Mindanao）南部的非正规移民，他们的自我认同包括苏禄人（Suluk，又称陶苏格人 Tausug）、巴瑶人（Bajau，又称萨马人 Samal）、米沙鄢人（Visayan）、伊隆戈人（Illongo）和宿务人（Cebuano）等。尽管有较明确的聚焦点，但作者访谈的大多数非正规移民显示出交融的海洋传统特征（maritime heritage），说明了他们的多元背景。作者在书中区分他们时也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多样性。在阐明对这些非正规移民选择返回沙巴非常有吸引力的“家（home）”的概念时，导言写道，它寻求将“持续的政府审查之下移民生活的重要元素”纳入进来，比如“人类和非人类间的联盟和网络，以及这些要素如何激励”他们做出选择（第1页）。

本书试图说明海洋，特别是苏禄海（Sulu Sea），作为一个“被低估的能动者”（“underappreciated agent”，第2页），如何在沙巴山打根（Sandakan）的非正规移民不得不对他们非正规行为产生的危险后果时，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和力量。作者用“远洋联盟”一词来指代这些人与苏禄海的关系。如作者所强调的，这一路径“旨在阐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强大，从而改变我们在结构性限制下理解人类流动性的视角”。鉴于现有文献要么强调沙巴非正规移民面对的推拉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要么关注此类移民的社会政治影响（第5页），本书提供的新路径非常必要。导言部分集中展现了非正规移民的声音，展示了他们与海洋之间的独特联系。他们认为遭遇移民和边境执法及其后果时，这种联系就是一种联盟（persekutuan，一个国家，也是一位盟友）（第3页）。

本书的导言部分还介绍了沙巴的移民危机。接下来的四章分别记叙了关于居住在沙巴山打根的非正规移民社区内不同人群的案例研究，例如男性、女性和青年。这些案例研究捕捉了当地非正规移民的不同方面，以及在马来西亚移民和边境执法制度的大背景下非正规移民与苏禄海水域的关系如何产生互动变化。

本书的第二章深入地探讨了非正规移民所表达的“sini”（此处）概念，以支持他们反对强制遣返的权利主张——即他们在沙巴自由居住生活的权利。在谈论他们所受移民法规 and 政策的严重影响时，社区成员通常会说：“Kami urang ‘sini’”（我们来自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如何为 sini 赋予意义从而定位自己。根据一位在街头卖水果的非正规移民的说

法，“sini”指的是“整个地方”（第37页）——这个地方不仅限于山打根，而是整个沙巴州。一位77岁的苏禄女性诗意地解释说，“sini”的意思是“任何被海水淹没的土地，那就是我们来自的地方。从一端到另一端；土地被水舔舐，海洋被陆地拥抱”（第62页）。一位30多岁的船夫指出，“大海在哪里”，他“就属于哪里”（第63页）。他解释说，“sini”就像一口井（perigi）和一面墙——perigi代表大海，而墙代表环绕大海的岛屿（第63页）。赋予“sini”一词的意义，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与一个地方联系起来，而不是固化的种族概念。这个地方超越了殖民时期人为划定的边界，以及这一边界与种族化和他者化过程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sini”非常深刻。

在第三章中，作者展示了留守（tinggalan）妇女的经历，她们的丈夫因违反国家移民法而被强行带离山打根。本章揭示了留守女性与苏禄海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的联系帮她们在伴侣身上定义男性特征，例如灵活（licak, flexible）和坚强（或坚韧，liat），她们认为这些特征很有吸引力。作者还详述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留守妇女如何认为大海是“浪漫的，而且任何在海上工作并了解大海的男人都可以沉浸在情感中（menyelami perasaan）——一个别有深意的双关语”（第80页）。作者讨论的留守女性的经历表明，当她们共同寻找方法来应对分离的痛苦和来自她们社区的、为终止独身而缔结新婚姻的压力时，大海如何成为这些女性回忆她们与伴侣的浪漫生活的重要参照系。

本书的第四章讨论了被驱逐的非正规移民时常踏上的返回沙巴的危险旅程。作者的个人故事记叙了返回者基于他们的海事知识，行动上（literally）与精神上与大海谈判的各种方式，希望能在沿海移民和边境执法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抵达目的地。第四章还强调了渔民在运送这一群体到沙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渔民之所以扮演这个角色，除了可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是因为他们“出于共同的传统和种族考虑，倾向于帮助非正规移民提供通道……”（第114页）。

本书第五章重点阐释了年轻的非正规移民的经历。他们出生于沙巴，由于身份问题成为“非正规”移民。在他所称之为“家”的地方，这群年轻人试图在被排斥感和由自身群体“非正规性”而产生的恐惧之间找到出路。本章重点介绍了这些年轻人如何栩栩如生地讲述潜在在海上、威胁海边居民的怪兽的故事和神话。后来，他们又反口说自己才是那些故事和神话中讲到的怪物，不然国家怎会一心要驱逐他们。作者断言，这一具体行为“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年轻人如何认识自己，以及他们归属感和陌生感（foreignness）的双重性”（第128页）。本章指出，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归因于年轻人接受的非正式教育和接触的在线平台。同样值得

注意的是，年轻人与大海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大海如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面对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时可以相聚其中、寻求安慰。作者观察到，这种紧密联系通过口述历史及其他体现海洋丰富遗产的传统习俗被保留下来。

本书中发掘出的非正规移民的声音，将超越人为划定国界的地方与他们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指向了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概念“文化区（cultural zone）”的存在。这个文化区在历史上植根于被称为“努山达拉（Nusantara）”或马来世界的海洋文明，在其间迁徙是一种常态。这些声音揭示出沙巴的非正规移民是一场关于种族化、性别和阶级的危机，值得仔细研究。它们提供了可以挑战关于边界和种族的主流叙事的重要洞见。对主流叙事的挑战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叙述合法化了当前的移民执法制度，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和不稳定。有鉴于此，《非正规移民与马来西亚沙巴边境之海：远洋联盟》是对移民研究的宝贵补充。

（英文原文见 Fikri, F. N. (2022). Book Review: *Irregular migrants and the sea at the borders of Sabah, Malaysia: Pelagic Alliance*.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41(3), 464–466.
<https://doi.org/10.1177/18681034221134199>,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尹一凡

编译：陈俊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本栏目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观点与立场